

基督徒在香港

—基督徒合一祈禱週的反省—

魏志立著
林瑞琪譯



今年一月二十日主日上午，胡振中主教在聖若翰大教堂一次聖餐禮儀中講道。雖然胡主教是本港天主教領袖，而聖若翰大教堂却是聖公會的主教座堂，但並不因此而引起人們的驚訝，因為這正是一年一度香港基督徒合一祈禱週的開始。胡主教應座堂主任寇保羅牧師的邀請在禮儀中講道，他談及基督徒必須緊密合作，彰顯主榮，為香港市民服務。無疑，這兩大宗教團體在某幾方面較易聯合——他們有類似的禮儀傳統，同樣肩負着拓展堂區、教育及社會工作三方面的使命，但這種密切的關係，只不過是一個規模更大的運動的事例，目的是促使本地所有基督教會增進彼此的了解，加強互相的聯繫。

本文下筆之時，祈禱週剛結束。在這剛過去的一星期內，代表不同宗教的基督徒聚在一起，祈禱頌唱，慶祝共同的信仰，追隨耶穌基督。這是鞏固舊聯繫、建立新友誼的時刻，是交流、關懷及聆聽的機會。在祈禱週結束之前，各教會合辦了多項慶祝活動及交誼節目，證明我們彼此間的相同之處遠遠超過構成我們分裂的差異之處，也顯示香港的合一運動仍在邁進。今年合一週選用的主題是「與基督一起出死入生」，是一個直指基督徒信仰核心的主題：跨過死亡及罪惡，進入基督的新生命中；為仍舊分裂的基督徒，這是一項挑戰，催促他們尋求具體途徑和方法，去一起活出這個新生命。

基督徒在香港

在這擁有超過五百萬人口的華人社會，基督徒人數約為五十萬，其中天主教和基督教約各佔一半。不過，這個人口比例數字，並未能反映出基督徒在香港社會的鉅大影響力。如果你和我一同在九龍市中心的大動脈——窩打老道上走一趟，看看沿途有不少基督宗教的建築物，也許會有助於了解基督徒參與社會的深度及廣度。

離開新界，穿過獅子山隧道出九龍，我們首先見到浸會學院矗立在路的左邊。這學院有學生五千多人，其大學地位，可望於不久的將來受到政府承認。學院毗鄰的，是擁有二百張病床的浸會醫院；轉角處則可以見到基督教末世聖徒教會中心，現有百多名積極的海外傳教士，分佈在港九各地工作。趨近德雲道，則是中國神學研究院，有全日制學生三十名，兼讀生三百多人，師資優良，為傳道工作培養出不少聖經教師及會堂領袖。轉回窩打老道，我們會經過天主教方濟各會在本港的總務處、天主教教區牧民中心、以及瑪利諾修院學校，這所學校是本港有名的女子中學，有學生超過二千五百人。學校對面是聖德肋撒堂，是全港信衆最多的天主教堂區，每年約有五百多人領洗（大約也有同等數目的婚禮舉行）。緊靠着聖德肋撒堂的是明愛社會服務中心及青年中心。明愛中心是天主教的社會服務機構，在全港設有超過五十間服務中心。

我們可別忘了指出路上經過的聖公會教堂及其附設小學和弱智學校。基督教宣道會及海外神學院就在鄰近。繼續沿窩打老道走，我們會經過五旬節聖潔會堂，而這座嶄新

的建築正好面對着培正中學。值得一提的是，培正中學不但擁有超過三千五百名中小學生，更具有九十多年服務本港的悠久歷史；浸信會聯合總辦事處就在附近，而浸信會神學院亦與這所學校相鄰。再過去就是門諾會中心，之後是基督教女青年會大廈，為外地旅客提供一百五十個取價相宜的客房。在我們穿過鐵路橋時（這鐵路貫通香港與中國大陸），便會見到一所天主教男子中學、循道會教堂及社區中心、信義宗教堂、信義宗出版社、真光女子中學及另一間信義宗的男女中學。每間學校大約有學生一千多人。現在我們差不多走到路的盡頭，窩打老道二十三號就是中華基督教男青年會。這幢樓高十八層的大廈是基督教男青年會在本港的總部，其下設有二十七個分支辦事處，有會員超過六萬人。大廈內有三百五十個房間，可供海外訪客留宿；另有七層撥作青年活動及辦公室之用。

在窩打老道上的簡短行程，不但能使我們看到各式各樣的教會，而且也認識到它們組織完善，在香港社會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據說，在本港約有百份之四十的學校及差不多半數的社會服務機構，都直接與教會有關。我們在窩打老道上所見到的這些機構，絕大部份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期間成立的。當時，他們在人力及財力上大部份倚靠海外傳教組織的支持。時至今日，情況已經改變。大部份海外人士都已退休或歸國，他們遺下的空缺都由本地人擔當，因而帶給這些機構一份新的活力。目前，教育及社會服務的大部份經費均來自政府，與本港其他公益團體的存在方式相同，因而，當本港面對前途問題時，便會產生一定的問題。毫無疑問，教會願意面對未來，投身社會，繼續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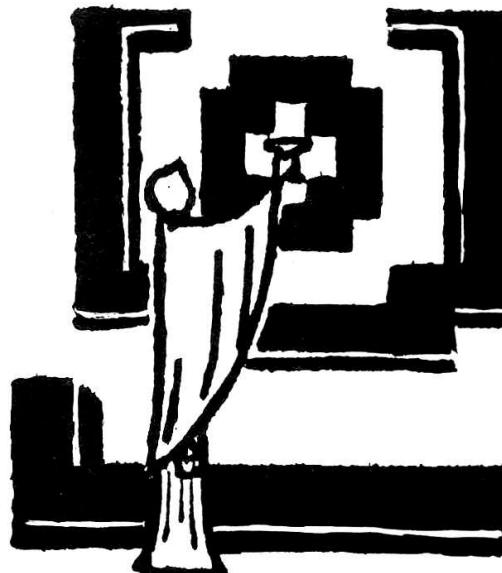
力，使香港社會不但充滿正義及和平，而且生活質素也洋溢着基督徒的愛和服務的理想，但這願望可否實現呢？基督教會又能否覓得足夠的人選去為同一的基督徒遠景而獻身呢？政府方面會持怎樣的立場呢？目前政府的資助使政府可以決定一般行政程序及基本政策，但將來政府如何履行這份責任呢？正因為大家都面對着共同的問題，基督教會之間便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機會，聚合一起，加深彼此的了解，推進團結。

香港教會發展史

目前香港約有一百二十五個不同的基督徒團體組織。雖然天主教在東南亞傳教的歷史悠久得多，可以遠溯至葡萄牙海上冒險家東來的時代，但天主教和基督教（其傳教運動與十九世紀初期西方國家在亞洲的擴張同時）却是在香港於一八四一年成為殖民地時才到來的。在起初及繼後的許多年間，香港只被視為往中國大陸傳教的踏腳石，傳教組織以香港作為差遣傳教士進入中國大陸的基地。隨着一九四九年新中國的成立，香港變成基督徒的避難所，中國各地的海外傳教士及華人教會，都紛紛湧入本港。有些人從香港再轉到其他地方，有些則留下來發展。正當本港由一個轉口港發展成為一個東南亞主要的工商業及金融中心之際，基督教會亦興起成為社會上一股積極的力量。香港政府的一貫政策，是鼓勵「私人機構」（大部份是與教會有關的團體）主辦教育及社會福利事業，因而促使教會廣泛參與社會建設，但亦同時使教會變得相當制度化。

基督教會發展史上的另一項共同點，就

是她們與最初派遣傳教士來港的一些國家的姊妹教會，仍然保持着密切的關係。基督新教傳教士主要來自北歐及北美洲，包括英國、德國、斯堪的挪維亞半島各國、美國以及加拿大。而香港天主教則一向深受南歐天主教傳教會的影響，早期葡萄牙、法國及意大利傳教士之居於支配地位可引為例證。今日，絕大部份教會領袖及成員都是中國人，但這並沒有削弱到本港教會在國際上的聯繫。相反，本地教會在增強自我身份及獨立性的同時，亦加深了國際基督徒團契的歸屬感，同在主的祭台前享有平等的地位。我相信這種國際性質或多或少可以解釋，何以教會不但在教育及文化方面對社會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而且也成為社會的道德良心及青少年的推動力。香港的基督徒人數雖然不多，却能透過真正投身及公開表達信仰，使基督徒的價值觀在社會上獲得普遍接納，與最初派遣傳教士來港傳福音的「基督徒國家」相比較，不遑多讓。



繼本港教會絕大部份領導職位已由本地人擔當、並在過往十年間亦逐步培育出有能力的神學家及聖經學者之後，天主教界及基督教界又出現了另一些新的問題：香港正要展開它歷史上新的一頁。中英雙方於去年達成協議，將香港的主權交回中國，並將香港定為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因此，不但社會結構要有大改變，教會結構也要有大改變，因而不但影響基督徒對自身的想法，也反映出他們與主的關係，甚至牽涉到他們與個別基督徒及整個基督徒團體之間的關係。

合一運動在香港

正當基督徒合一祈禱週的理想成為基督教會內一股強大的推動力之際，基督徒比其他人更關注基督徒之間所存在的隔閡和分裂，而這個問題亦由於宗派及會堂的繁多而日趨複雜，因為每個宗派都有他們自己獨特的歷史背景，更發展出本身獨有的信仰及崇拜模式。

本港的合一運動是由基督教界首先發起，天主教會在梵二以後才積極參與。早期基督教傳教士人數不多，由於要共同面對傳福音的工作，因此很少注意彼此之間的宗派差別。他們常彼此交換講道，友好往來。今日組織得更完善，更有經驗的基督教協進會，便是執行這個傳統，有不少宗派加入成為會員。它製造機會，讓各成員彼此接觸，互相諮詢，而它本身也是普世基督教協進會的一員。協進會對推進本港的合一運動十分積極，不但與各成員宗派緊密聯繫，而且亦密切接觸天主教。我個人認為它是本港合一運動的動力。儘管仍有些宗派不加入協進會，但

已加入的成員都由於共同關注傳福音、受差遣及教育事工而結合在一起。這是各宗派容許差異、尊重獨立的一種合作形式。

二十年前，聖公會白約翰會督與天主教白英奇主教同跪於聖若翰大教堂的祭台前，為基督徒合一而祈禱。這標記性的行動，標誌出天主教會正式加入本港合一運動的行列。這個改變並非是突如其來的，而是由多年來的非正式接觸，不斷加深欣賞彼此的共同之處，以及在教育及社會服務各方面多年來所建立的關係所促成。本港天主教既發源自葡萄牙、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等非英語國家，則愛爾蘭籍耶穌會士、美國籍瑪利諾會神父、以及其他操英語的傳教士團體，亦有助於打破文化屏障。二次大戰之後，德國亦透過 MISEREOR 及明愛這兩個福利機構，在本港教會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一九六五年，梵二大公會議更積極鼓勵合一運動再向前邁進。機構上的聯繫不斷增長，而天主教徒及基督教亦找到更多合作之處。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與天主教代表著本港合一運動的主力。可是，仍有不少其他各式各樣、規模較小的基督團體，由於他們缺乏中央組織，因此難以將他們歸類。這些團體中，大部份在傳福音的觀點上都很接近基要派，高度獨立，觀點相當個人化。他們通常是以一名「牧師」為中心而發展出來，有時甚至連一所教堂也沒有，聚會就在信友的家中舉行，以家庭為基督徒生活的中心。他們完全自給自足，靈修集中於個人與基督的內在關係上。在一定程度上，這種方式正切合中國人所了解的「團體」，就是指：一群人，為了一個共同志趣，或由於共同身份而組織起來，或為一個會社。這些教會的數目增長迅速，因為會眾可以自由向外發展，按同

一路綫另立新的堂會。雖然這些團體並沒有具備禮儀傳統、歷史背景、或普世教會的遠象，但他們對基督却懷着熾烈的愛火，信靠聖經中自我啓示的上主。

在合一途上令人頭痛的障礙之一，竟出自基督徒引為信仰及崇拜的泉源——聖經。四百年前當利瑪竇及他的同伴抵達中國時，即着手以拉丁文聖經版本為基礎，進行中文翻譯。馬禮遜及其他基督教傳教士於十九世紀初方抵達中國，但他們翻譯聖經却是按照希伯來文及希臘文原本。既然天主教的正典聖經（以七十賢士本為基礎）與基督教（以傳統希伯來正典為基礎）不同，過去的解決辦法就只有容許兩個不同傳統的聖經版本翻譯成中文。因此，所有人名、地名、一般基督教宗教及希伯來神學名詞，以至對「天主」的確切稱呼，都被譯成兩組截然不同的詞彙。這樣做法使基督徒很難找到一個大家都滿意的聖經版本，以便一起祈禱崇拜。所以各方面人士都願意尋求一部中文合一譯本。在

最近出版的英文譯本中，「現代人的喜訊」在英語地區中，一如「新訂本標準聖經」，已普遍獲得天主教青年的接受。但中文譯本方面所遭遇到的困難却大得多。假如說言語是標記，蘊涵着內心的感受及意念，則中文更應被視為直接傳達意義而並非純粹是傳達觀念的發聲系統。在選用適當字眼以譯出天主聖言時，我們可別低估會遇到的困難。多年來，聖經公會一直希望重新翻譯聖經，天主教人士亦曾參與這項工作，但主要的障礙在於普遍的接納；由於基督教團體宗派繁多，很難取得一致的同意。一九七二年，香港聖經公會推出了中文版「福音」，繼而又將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初版的和合本中文聖經再版發行，亞洲歸主會隨後又出版了簡體字中文聖經。另外兩個基督教基金會，亦於一九七五年出版了全新獨立的中文譯本。天主教方面，方濟各思高聖經學會於一九六八年首次出版了全一冊的天主教聖經。過去他們也會翻譯及出版了個別的新舊約書卷，但將所有經卷置在同一冊內，在天主教界尚屬首次。此外，在操粵語的天主教信友當中，也流行着各種不同的聖經章節譯文及修改本，以供禮儀之用。不過，我們仍舊需要一部可以共同使用的中文聖經。如果要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一同祈禱，一同宣講，看來尚須等待一段日子。

教會之間在神學上的分歧亦阻碍了合一工作，但這方面在國際上却有很大的進展。代表基督教各主要教派的聖經學家及神學家經常聚會，交流觀點，以排除過去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困難；這在主流教會方面尤為明顯。基督教與天主教神學家之間的討論，藉着對基本訓導及信仰內容的批判註解及清楚闡釋，使基督徒日趨接近。不過，在香港，要



找出交談的共同神學基礎，會更為複雜。大部份國籍牧師及傳道員可說深受浸信派神學所影響。他們強調實際行動，以救主耶穌為中心。罪與救援、十字架與聖經，都是他們宣講的主題。聖經故事是他們培育基督徒的主要教材。從傳統的天主教觀點來看，這樣的教材似乎是忽略了一些較複雜的信仰奧蹟，比如：天主聖三、教會學的發展，而教會學正論及所有基督徒，也涉及他們與切願拯救人類的天主的關係。這些分歧屢屢障礙了嚴肅的神學交流。香港天主教目前正進行更新運動，強調個人信仰，讀經祈禱，也着重以謙恭的服務表達出基督徒的生活。種種跡象都顯示出，這一更新運動將有助天主教團體開放自己，與其他基督徒發展更深的共融，產生更豐盛的神學交流。

儘管合一仍存在着上述的種種困難，但仍有很多令人樂觀的積極因素，絕大部份基督徒運用同一種語言（粵語），擁有同一文化（中國文化）。在神學上及教會事務上所用的語言是英語，這也是教育界及專業人士所常用的語言。此外，本地市民性格樂觀，慣於容忍，且歐洲基督教會分裂所造成的歷史創痛，影響中國基督徒不深。我們往往可以見到，多個隸屬不同教派的基督徒和諧共處一室，比方：同一個家庭內的成員就讀不同教派的學校、不同教派的男女結成夫婦。而這些家庭都很關心合一，因為他們個人受到分裂的影響，然而他們却十分欣賞對方優美的一面。

無疑，當前仍有很多消極的因素妨礙基



督徒合一。我們必須互相尊重、信賴，努力克服彼此的不信任，彼此增加認識。隔離只會加深對教會訓導及習俗的誤會，過往的偏見及誤會不能一朝一夕消除。不過，教會領袖目前正愈來愈覺察到教會分裂所造成的消極效果，也深悉它如何破壞傳福音的工作，及如何經常成為聖神活動的嚴重障礙。世界常有分裂的趨勢，自私自利，忽略對我們週圍的窮人及無助者盡應有的責任，甚至為爭取自己的地位而不惜犧牲別人等。這些事情都是教會歷史的一部份，自教會初期便已造成分裂。我們應就這些事情自我反省，並將自己改變過來，攜手努力，使基督所預許的正義、和平、合一的天國，早日在人間實現。